

一生，为祖国、为真理呕心沥血、忍辱负重的一生。它以其巨大的感染力和说服力吸引着广大读者。读此书，可使懦者立、顽者廉、说假话者戒！

本书优点很多，因限于篇幅，不再赘述。感到美中不足的是，对马老的哲学思想、政治观点和经济理论及其形成的历史背景和思想渊源尚缺乏深入的研究，对主人公心灵的开掘也不够。这就要靠其他学术专著和文学传记来担当此任了，而对本书则不应苛求。

马老是我学生时代早就景仰的学者。五十年代，我有幸在他身边工作四、五年之久，亲炙其教益，深敬其为人。高风亮节，如松柏之坚贞；胸怀坦荡，若东海之浩瀚。如今，马老离开我们已经四年多了，每念斯人，譬欵犹存，展读此书，倍感亲切。故不揣谫陋，草此短文，用寄哀思，并励来兹。

（本文作者为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

一部具有开拓性的学术著作

——简评乌丙安的《中国民俗学》

柯 杨

以研究民间生活与文化为基本任务的民俗学，传入我国已有六十多年的历史了。由于东、西方民俗学的发展对我国学者的影响，以及我国民俗学家的不断探索，这门学科三十年代在我国曾有过一个小小的繁荣时期。尽管当时熟悉这门学科的人数有限，调查与研究的范围也比较狭窄，但其从无到有的首创性的历史业绩，则是应当肯定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不但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而且也给学术的发展带来了困难，使初步奠定

• 学者评论 •

了基础，刚刚进入发展期的中国民俗学半途夭折，出现了这门学科的断裂。解放后，作为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本应当对这门研究人民生活与文化的社会科学予以高度重视，但由于极左路线的干扰，它又同社会学、民族学、伦理学、宗教学等学科一道，被宣判为“资产阶级学术”而遭到了极不公正的待遇，甚至被“撵”出了大学课堂，这不能不使人们感到遗憾！

恶梦终于结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民俗学作为社会主义祖国学术百花园里的一朵鲜花，也得到了复苏。中国民俗学会和辽宁、浙江、江苏、吉林等省民俗学会的建立；《采风》（上海）、《山海经》、《风俗》（浙江）、《楚风》（湖南）、《乡土》（江苏）、《民俗研究》（山东大学）、《民间工艺》（南京艺术学院）等报刊的创办；各地报刊上民俗调查报告和有关学术论文的发表等等，都是明证。正是在民俗的研究越来越多地受到人们的重视，但又十分缺乏适合我国国情的民俗学理论读物的情况下，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乌丙安教授的新作《中国民俗学》，这的确是很及时的，值得称赞，值得推荐。我认真阅读后，掩卷沉思，觉得在以下三个方面感受最深：

首先，这部书不同于我国民俗学出版史上任何一部理论性专著，具有明显的独创性、开拓性和真正的中国特色。从民俗学传入中国算起，虽然也曾陆续出版过一些这方面的书籍，但大都是简介、翻译或编译外国学者的有关著作，最多也不过是外国的理论加一点中国的例子，还没有人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从整个理论体系上加以深入的探究，更不要说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指导了。《中国民俗学》则不同，它可以说是我国第一部从本国民俗实际出发，用马克思主义的民俗观来分析种种具体民俗事象的、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理论著作，这不但体现在对民俗事象的科学分类上，而且体现在对中国民俗的产生、发展和演变的规律、民俗的性质、民俗活动的构成，以及对我国多民族民俗特色

· 学者评论 ·

的概括及其意义的理论阐发上。比如，作者以其广阔的视角，把中国民俗分为经济民俗、社会民俗、信仰民俗、游艺民俗四大类，大大扩大了以往把民俗主体只拘泥于礼仪习俗和信仰习俗的狭窄领域。这不但把民间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联系在一起，使读者可以从中领悟到许多民俗事象产生的根源，而且，也使我国民俗学的研究范围趋于全面和完善。再比如，作者除了汉族民俗，还注意到了其他五十五个兄弟民族的民间习俗，并对各民族生活文化在历史上的相互影响与交融进行了一定的理论性探讨，这对进一步认识中华民族这个多民族大家庭的不可分割性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中国民俗学》是一部在学术研究方法方面颇具开放性的著作。与开放性相对立的是封闭性，其主要弱点在于：静态的事实罗列多，动态的现象研究少；定性的阐发多，定量的描述少；纵向的回顾多，横向的考察少；微观的分析多，宏观的综合少。《中国民俗学》却不是这样。作者对我国的种种民俗事象既善于从历史的、时间的角度探根索源，观流识变，又善于从地域的、空间的角度比较其异同，环视其分合。书中关于家庭关系的发展趋向、婚姻中俗制的演变以及岁时节日与信仰习俗之间关系的探讨均属此类。对我国民俗中信息量最大的事象，如有关衣、食、住等生活民俗以及人生仪礼中的婚俗等，作者也都给予了相当的篇幅，使其能充分展开，写得丰富而详尽。我国家庭、亲族的民俗传承和民间信仰习俗特征等，本来是涉及面广、情况极为复杂的一部分，但经作者精心梳理、科学归类和深入分析，便显得脉络清楚，阐发透彻，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第三，《中国民俗学》在论述过程中把大量存在的日常民俗和较少出现的异常民俗结合起来，以前者为整部著作的重点，这是很有见地的安排。一般讲来，人们总是对非常之事大感兴趣，而对司空见惯的“常态”缺乏应有的注意和深思。作者与我们通

· 学者评论 ·

常见到的那种着眼于奇风异俗的搜求者和研究者不同，他用绝大部分篇幅对大量存在、反复出现的民俗事象进行概括、分析和论述，把人们经常见到、习以为常，甚至觉得没有什么学问可言的风俗习惯加以条理化、系统化、理论化，给读者打开了一扇认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类自身的新窗口，使人们能够从常态中见神奇。每个人都在一定的“民俗圈”中生活，都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本民族民俗传承的影响和制约。但是，对于这一点，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清楚地、自觉地感觉到的，而能从理论上加以分析和认识的，恐怕就更少了。《中国民俗学》能够从自己学科的角度，对人们早已司空见惯了的事物和置身其中的活动投以新的一瞥，讲出了令人信服的道理，充分显示出了它的优势。

作为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俗学专著，《中国民俗学》是有自己的独创性体系的，这本身就不简单。没有长期的资料搜集工作作为后盾，不经过长期的思考和研究，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当前，一切社会科学都面临改革浪潮的挑战，对长期以来学术研究中形成的一些固定概念、术语，固定的理论前提和思维方法进行必要的反思，一定会为各门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改革，提出新的任务，开拓新的领域。《中国民俗学》在这方面既有值得借鉴的东西，也有尚待完善的部分。在中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民俗学理论专著，的确是太少太少了，衷心希望有更多的不拘一格的民俗学学术著作问世。多，才能给教育界和学术界提供更多的选择机会，而有选择的余地，就意味着进步。我觉得，对一门历史不长，又几经挫折的学科来说，目前不是要用“一”来规范“多”，而是要“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只有这样，才能缩短差距，迎头赶上。

（本文作者为兰州大学中文系系主任，副教授；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民俗学会理事。）

· 学者评论 ·